

重劃文學「本土」的邊界： 一九七〇年代新加坡、台灣小說中的 工業區與鄉村

張韡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文摘要

七〇年代，新加坡、台灣歷經政治危機以及在經濟上鑲嵌入新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而晉身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簡稱 NICs)，兩國鄉土小說聚焦國家產業政策下蓬勃發展卻充斥階級衝突的工業區、一級產業經濟凋敝不振以及人口外移的鄉村，這些小說在敘述跨國資本和黨國威權主義如何影響地方的過程中，「本土」、「鄉／國」的輪廓愈來愈清晰。本文第一部分說明兩國可資比較的政治經濟與文學史背景。第二部分援引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對「階級抗爭反而會產生地方性忠誠」的觀察，闡述崇漢(1945-)與楊青矗(1940-)書寫工業區的小說重劃了文學「本土」的邊界。前者藉由將馬來西亞他者化，投射新加坡自身無法實現的階級革命慾望，區別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後者關心南部工廠的小說書寫乃至親自投身地方選舉的行動，觸發了官方政治分離主義的警鈴。第三部分分析呈向風(1956-)、崇漢以及王拓(1944-2016)、宋澤萊(1952-)小說書寫經濟凋敝鄉村的兩種敘事模式，分別為：「離開家／鄉，放棄原本賴以維生的一級產業」以及「暴露或挑戰家／

鄉一級產業不合理的運銷制度」。兩國國內城鄉不均等發展與國際分工經濟體系連動，國家本身不能控制，「家／鄉」不再能安居樂「業」，地方認同反而藉由地方危機加強。

關鍵詞：新加坡鄉土文學、台灣鄉土文學、新興工業化國家、國家意識、地方意識

The Rise of National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Industrial Parks and Rural Areas in 1970s Singaporean and Taiwanese Novels

Chang, Wei-Hsin

Doctoral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70s, Singaporean and Taiwanese novels focused on the industrial parks that thrived under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 but were rife with class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 rural areas suffering from economic decline in the primary sector and population outmigration. After both countries experienced political crises, they became embedded in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emerging as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 As a result, the narratives in their novels increasingly clarified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 and “locality” in the context of how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state authoritarianism affected workers’ live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comparable political economy and literary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second part references David Harvey’s observation that “class conflict can lead to local loyalties,” explaining how the novels of Chung Han (1945-) and Yang Ching-Chu

(1940-) redefined the literary “national” boundaries in their depictions of industrial parks. Chung Han othered Malaysia, projecting Singapore’s unfulfilled desire for class revolution and distinguishing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Yang Ching-Chu’s novels focus on the factories in southern Taiwan and his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local elections, which has raised suspicions from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hat he supports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two narrative models presented in the works of Cheng Hsiang-Feng (1956-), Chung Han, Wang To (1944-2016), and Sung Tse-Lai (1952-) that depict economically declining rural areas: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and abandoning the primary sector that once sustained them” and “exposing or challenging the unreasonable marketing systems of the rural primary sector.” The uneve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oth countries is interconnec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hich the state itself cannot control. The “home/ country” can no longer provide a stable livelihood, and local identity is instead reinforced through local crises.

Key words: Singaporean Local Literature, Taiwanese Local Literature,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ocal Consciousness

重劃文學「本土」的邊界： 一九七〇年代新加坡、 台灣小說中的工業區與鄉村

一、前言：政治危機以及崛起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兩小龍」

我主張對民族（nation）做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他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¹

我們對自己是誰、身在何處，以及應負擔什麼責任的感覺（簡言之，就是我們的認同），身受我們對於自身時空位置的感覺所影響。換言之，我們通常會以空間（我屬於這裡）和時間（這是我的生涯、我的歷史）的角度來定義自己的認同。認同危機出現於劇烈的時空壓縮期（我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何在？我能有什麼未來？）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資本主義：片斷化的工廠〉²

* 承蒙匿名審查人不吝指正及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¹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年），頁41。

²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志弘等譯，《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議》（新北：群學，2010年），頁183。

肇因於冷戰地緣政治，加諸新加坡、台灣兩威權政府的統治需要，以美國為中心的跨國資本藉由靈活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將生產過程分散於世界空間，兩國被納入新國際分工秩序，因此兩地民眾在新時代感覺結構中急需重新確認自己的位置和認同，正如上述哈維引文所示。儘管二戰之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合併的時光轉瞬結束、台灣作為「1949 年以前中華民國」的邊陲一省也僅有短暫年歲，但觀諸五、六〇年代主流小說，其空間想像並未離開「馬來亞」與「秋海棠」影子籠罩的範圍太遠。然而，當 1965 年新加坡突然被逐出馬來西亞不得不獨立、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被迫孤立，兩國在面臨政治危機的同時，所幸在經濟發展上十分亮眼，逐漸晉身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政治經濟的巨變，使七〇年代新台小說聚焦國家產業政策下蓬勃發展卻充斥階級衝突的工業區，人口外移以及第一級產業經濟凋敝不振的鄉村。

政治急遽改變、經濟高速發展，反映在文學思潮與創作上是重新界定「我們」是誰、「我方」何在？深入思考我們的社會如何轉型、是誰受益？政治的急遽改變，具體指新加坡戰後二十年間加入「馬來（西）亞」的希望幻滅，以及台灣 1949 年以後「正統中國」的合法地位不再被國際承認。新加坡 1965 年被迫獨立後，學者於 1970 年提出「新加坡華文文學（簡稱「新華文學」）」取代「馬華文學」一詞³，八〇年代官方提出「建國文學」確認文學獨立性⁴。台灣 1971 年被外交孤立後，1977 年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在辯論何為「鄉土」的過程中使「本土」論述日益明朗⁵。隨後在八〇年代出現了「台灣文學正名論」，不再使用「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一詞⁶。經濟的高速發展，是指新加坡和台灣加入國際分工後，被捲進資本主義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之中。哈維認為我們始終存在於

³ 1965 年新加坡突然獨立，本地學者黃孟文於 1970 年首創「新華文學」一詞，取代「馬華文學」。參見：陳志銳，〈新加坡華族文化百科：新加坡華文文學概述〉，（來源：<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literature/overview-of-singapore-chinese-literature/>，2024 年 8 月 31 日）。

⁴ 1982 年新加坡官方提出「建國文學」並由南洋商報出版社編選一套「吾土吾民創作選」，以反映建國十七週年新加坡人國家意識的增長。參考：王鼎昌，〈獻詞〉，收錄於南洋商報、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編，《吾土吾民創作選小說（上）》（新加坡：南洋商報，1982 年），頁 1-2。

⁵ 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各家論述參見：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78 年）。

⁶ 關於 1981-1984 年「台灣文學正名論」的始末參見：謝春馨，〈八〇年代「臺灣文學」正名論〉（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 年）。

資本主義動力之核心「以時間消滅空間」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革新，影響了時空體驗的轉變，造成時空壓縮的感覺⁷。他指出這種資本主義時空壓縮的過程，也可說是全球化的過程，從 1945 年起就是以美國為中心的⁸。七〇年代新加坡和台灣的產業發展，正好經歷了美國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由福特主義（Fordism）轉往靈活積累的過程，也就是本來在已開發國家本土「流水線標準化大量生產」的工廠，因跨國公司的出現，搬往開發中國家⁹。故此階段新台文學關心跨國資本和黨國威權主義結合下鄉土的改變，相比於五、六〇年代主流文學作品，已經沒有或較少提及馬來（西）亞和中國。兩國今日「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邊界，就是在此時期開始鞏固。

國家認同的建構除了是歷史的也是地理的，是時間的更是空間的。安德森指出國家或某一政治實體做為一共同體，有限「範圍」內「我們」當下的處境和可能的前途，被想像為同舟共濟、擁有共同命運。他的理論提供了我們「空間（主權領土）」、「想像（文學敘事）」可能召喚出「想像的共同體（民族／國家認同）」的範式，但具體如何召喚，本文則從哈維關注資本主義在空間裡日常運作的方法得到啟發。七〇年代新台兩政府系列空間治理，包含土地政策與產業政策，支配著國家主權領土內人民的共同經驗。而這一連串有效運作的空間治理又使兩地緊密鑲嵌入新國際分工之中，愈加突顯了新台作為獨立政治體兼經濟體的現實。因此在黨國威權與跨國資本主義結合下，兩國小說一方面再現了國家權力與跨國資本如何控制了空間，一方面再現了在此空間經驗下凝聚出的地方認同，並進一步對支配權力發出不滿和質疑。

五〇至七〇年代，新加坡和台灣官僚菁英為了穩定其有效統治範圍的主權和社會安定，開始著手經濟改革政策。英國殖民時期新加坡經濟結構單一，絕大多數為轉口貿易，二戰新加坡港口遭破壞以及戰後英國影響力消退，失業率高漲造

⁷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閻嘉譯，《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249-385。本書為了探究後現代狀況的起源，有泰半篇幅在探討現代狀況。

⁸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胡大平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66。

⁹ 同註 7，頁 159-248。

成嚴重政治問題。戰後二十年間，新加坡一直有著加入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以擺脫殖民地地位的願望，其理由是當時大部分政治菁英認為新加坡經濟無法脫離馬來半島腹地發展，因此自願在政治上矮化以換取經濟自主權力¹⁰。歷經 1963 年至 1965 年成為馬來西亞聯邦（Malaysian Federation）一員後，新加坡與吉隆坡在經濟、種族、教育政策等方面嚴重衝突，最後於 1965 年突然被逐出聯邦，在風雨飄搖中獨立建國¹¹。新加坡獨立初期遭受關稅報復，不得不將原本寄託馬來半島市場的期望轉為歡迎其他跨國企業投資的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 orientation industrialization）政策¹²。另一邊，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主要經濟部門為農業，其次為少部分初級工業。瞿宛文研究指出台灣工業化雖受益於日殖遺產和美援，但戰後初期台灣仍屬典型殖民地米糖經濟體，又全球經驗顯示美援不必然對經濟發展有幫助，要解釋台灣經濟奇蹟，更重要的還是土地改革與系列工業化政策¹³。因此與新加坡獨立初期夾縫求生的情況類似，退居海角一隅、奮力救亡圖存的國府經建官僚有著必須發展台灣經濟的動力。國府於五〇年代推動農村土地改革終結了傳統地主經濟，將接收來的日產四大公司民營化作為土改補償之一，引導農業資本轉型為現代工業，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策略扶植本國工業發展¹⁴。到了六〇年代，不約而同與新加坡一樣，轉為歡迎外國企業投資的出口導向經濟策略¹⁵。

1979 年新加坡和台灣正式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列為新興工業化國家，他們自六〇年

¹⁰ 葉添博等著，李慧玲等譯，《白衣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史（上）》（台北：季風帶，2022 年），頁 265-280。陳鴻瑜，《新加坡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79-86。

¹¹ 葉添博等著，李慧玲等譯，《白衣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史（上）》（台北：季風帶，2022 年），頁 331-340。陳鴻瑜，《新加坡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86-112。

¹² Haggard, Stephan, Tun-Jen Cheng, 〈第三章：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中外資本運作情形〉，收於弗雷德里克·德約（Frederic C. Deyo）主編，李嘉哲譯，《亞洲四小龍的政經分析》（新北：駱駝，1990 年），頁 61-62。

¹³ 瞿宛文，《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新北：聯經，2020 年），頁 17-27。此外關於農村土地改革研究請參考：瞿宛文，〈第三章：台灣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1949-1953〉，《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緣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新北：聯經，2017 年），頁 87-160。

¹⁴ 此四大公司是台泥、台紙、台工礦和台農林，詳細研究參考：瞿宛文，《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新北：聯經，2022 年）。

¹⁵ 瞿宛文，《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唐山，2003 年），頁 277-279。

代以來發展一系列相似的貿易與產業政策致使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成為歷史上俗稱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當中的兩者，是戰後開發中國家的翹楚¹⁶。新台相較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異軍突起，得益於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而其施行的政治基礎在於由國家菁英官僚主導以及國際政治同盟支持¹⁷。在國內，新加坡和台灣實施威權統治，利於強勢主導政策推行；在國際，新加坡受大英國協支援、台灣享美國政經和軍事扶持，兩者皆屬於冷戰反共陣營。此時英美外交首要目標是圍堵共產主義，政治考量優先於經濟，經援盟友可助其發展經濟以維持政權穩定，符合英美國家安全利益；其次對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企業而言，產線外移可減低勞動力成本，亦有經濟利益。是故包含新台在內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亞洲四小龍，皆處在一個「政治與經濟上均受支持的世界國家體系」¹⁸。

目前學界尚無新加坡和台灣小說比較研究，本文比較七〇年代新加坡和台灣標誌著「本土化」的鄉土文學的出現，在比較兩國小說敘事異同的背後，隱含著與第三地文學比較的視野，此「第三地」通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馬來西亞¹⁹。這是由於：第一，中國企圖抹煞台灣主體性的慾望不曾稍息。第二，現今的中國與過去的台灣皆抱持「大中華中心主義」把新加坡、馬來（西）亞混為一談，忽視兩地在英國殖民時期就分屬不同殖民行政區域，並且將所謂「新、馬『僑胞』」混為一體，但事實上二戰後兩地華人擁有迥異程度的公民權和國民地位，即使是在十分短暫的合併時期也是如此²⁰。換句話說，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透過比較

¹⁶ 關於六〇至九〇年代新加坡、台灣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區域）之國家總體生產毛額（GDP）成長率比較，請參考：黃閔新，〈發展型國家的持續與變遷：台灣及新加坡產業轉型策略的比較分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6。

¹⁷ 同註12，頁38-90。

¹⁸ 弗雷德里克·德約（Frederic C. Deyo），〈第七章：聯合、制度、與結合順序——東亞國家發展的策略性能力模型〉，收於弗雷德里克·德約（Frederic C. Deyo）主編，李嘉哲譯，《亞洲四小龍的政經分析》（新北：駱駝，1990年），頁175。

¹⁹ 十分感謝審查人建議筆者應該更加明確點出，進行新加坡台灣小說比較研究可替現有研究提供何種新視野與貢獻。

²⁰ 早在新馬合併以前，新加坡已有自己的自治政府，並且需要全民公投決定是否加入馬來亞。而且同一時期，新加坡華人的公民權受到保障，其政府強調「各族平等」；馬來亞華人要取得公民權的門檻相對較高，其政府主張「馬來人優先」。這也是為何日後新馬在合併短短兩年之後迅速分裂的原因，新加坡與吉隆坡無法在種族政策和公民權力達成共識，財稅分配和經貿政策也發生嚴重衝突。關於新馬合併始末，參考：陳鴻瑜，《新加坡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93-95。葉添博等著，李慧玲等譯，《白衣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史（上）》（台北：季風帶，2022年），頁296-330。

台灣、新加坡文學，重申台灣文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互不隸屬、將新加坡華文文學與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分別清楚。目的之二，新加坡和台灣是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唯二以華人移民為人口絕對多數組成的現代國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新興國家，藉由比較七〇年代兩國鄉土小說敘事，觀察在成為獨立政治兼經濟實體之後的新台，如何逐漸滋長出新本土／國家認同的想像，也可資證明台灣華文文學作為台灣國別文學，並非孤例²¹。

二、工業區：因階級抗爭而產生的「地方」忠誠

七〇年代，分別在新加坡和台灣都被譽為「工人作家」的崇漢和楊青矗，他們的小說即時再現了兩國威權主義與國際分工下的工業區情狀，包含不公平的工作評等和薪酬制度、未受保障的工安與職災問題、偏袒資方且不利工人的工會組織、透過威權統治壓制工人的反抗²²。肇因於冷戰反共的政治背景以及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此時期兩個威權政府既賦予工人基本勞動保障，同時又大大限制工人公民權利。新加坡 1968 年通過「勞資關係法」、「就業關係法」並修正「工業關係法」，國家得以合法仲裁勞資糾紛、抑制薪資漲幅和罷工自由²³。此外新加坡政府將五〇年代罷工罷課浪潮定調為受馬共指使或利用，因此在相關勞動法規之

²¹ 戰後初期主要發生於新加坡一地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迅速確認馬來亞（Malaya）華文文藝不是中國僑民文藝，而是作為「馬來亞民族文學之一」以共同承擔馬來亞民族反殖獨立的責任。他們既不想再做英國殖民次等公民、也不願再當中國南洋僑民，接著民間文藝思潮出現要求「默迪卡」（Merdeka，馬來語「獨立」之義）的「愛國主義文學運動」。新馬合併破局以後，建國伊始的新加坡就明訂國家三大族群語言文字和行政語言英文，為法定官方語言和國家文學。今日，作為新加坡國家文學之一的新華文學，與馬來西亞（Malaysian）華文文學尚無國家文學地位的境遇大不相同。關於新加坡「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和「愛國主義文學運動」，參考：黃孟文、徐迺翔主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2002 年），頁 77-105。關於新加坡各族語言文字地位見新加坡共和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第 153A 條，參考：不著撰者，〈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來源：<https://www.eld.gov.sg/legislation.html>，2024 年 8 月 31 日）。關於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無法取得國家文學地位的情形，參考：黃錦樹，〈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論馬華文學的創傷現代性〉，《中外文學》34 卷 8 期（2016 年 1 月），頁 175-192。

²² 關於兩位作家生平可參考：新加坡作家協會編，《新華作家傳略》（新加坡：新加坡國家圖書館，1994 年），頁 72。彭瑞金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97：楊青矗》（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7 年），頁 60-85。

²³ 張青，《新加坡：創造經濟奇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4。

外，尚有內部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簡稱「內安局」）可依「內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簡稱「內安法」）對涉嫌顛覆國家安全的疑似左派分子進行監視與逮捕。台灣在 1945 年由國府跨海帶來了「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辦法」，使勞工結社權和爭議權受到嚴格限制²⁴。加諸 1949 年以後又有凌駕於所有法令之上的「戒嚴法」，台灣警備司令總部得依此取締人民非法集會、罷工等行為。一黨專政下的新台以強大國家機器控制工會運動和工人發聲，創造了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廉價的勞動力、成就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在迎向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光明面背後，更籠罩著受資本主義剝削和監控制度規訓的陰影。

崇漢兩本中長篇小說，刻劃跨國公司透過工作評等制度以及規避工安、職災責任，以減低勞動力成本。《金光道上》（1974）描摹一群在裕廊工業區（Jurong Industrial Park）日資工廠工作的工人，不堪常態超時輪班、大量工安意外以及工作評等制度，因而罷工²⁵。小說高潮是工人無法忍受變相減薪而爆發勞資衝突，廠方以妨礙國家發展為由，擔心人力成本高漲可能使外國企業停止投資，要求工人犧牲小我，重新簽訂工作契約。新契約將廢除現行每年加日薪四角八分的三年薪金制，改為六等級統一薪金制，也就是將工人分為六等級，最低等級第六級將占工人總數八成，等級越高薪水越高，按等級每年調升月薪六元，至高以十年為限²⁶。勞方抱怨社會物價飛漲，新制度工作變多、薪水卻變少，又不滿本應代表工人的工會受資方把持，憤而集體罷工抗議，派出自己的工人代表出面談判。類似的故事還有《在風雨中》（1975），小說描繪一家在裕廊規模龐大的外資染色工廠發生數次工安意外，廠方避重就輕拒絕賠償引起勞方不滿，之後以石油危機不景氣為由關閉工廠逃避責任，將在一週內遣散員工。此舉挑動勞方累積已久的憤怒情緒，遂成示威行動，還招來工業區其他工廠工人和學生聲援。抗議活動一開始有「大人物」組成的工會準備代言勞方與資方斡旋，但工人不信任他們將其趕走後自己上場談判²⁷。這兩本小說的結局，都是政府公權力與資本家站同一陣線，

²⁴ 王振寰、方孝鼎，〈國家機器、勞工政策與勞工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3 期（1992 年 11 月），頁 10-11。

²⁵ 崇漢，《金光道上》（新加坡：人民文藝，1974 年）。

²⁶ 同註 25，頁 86-87。

²⁷ 崇漢，《在風雨中》（新加坡：人民文藝，1975 年）。

工人代表被特務逮捕，非星國公民被驅逐出境，大部分參與連署和抗議的工人都被解雇。《金光道上》悲觀暗示，如果想翻轉工人弱勢現況，或許只能將渺茫的希望寄託於「新加坡之外」的馬共革命，到了《在風雨中》則幾乎不抱期待。

楊青矗同樣有一些短篇小說描述本國和跨國大企業，藉由實施工作評價制度、削減勞工福利和保障，降低資方成本。〈工等五等〉（1970）描寫一家「廠區延綿三百多甲、全國數一數二、每年為國家賺進大把外匯」的大工廠，其下小技工陸敏成明明專業技術和工作內容、績效都與同僚差不多，但因他資淺又不擅與上司交際，被評為等級非常低的「工等五等」，每月所得不到較高等級「十二等」人的二分之一，且五年來都沒有調升，他就算白日上班夜晚兼職也無法養家活口²⁸。〈囿〉（1973）的男主角史堅松是北、中、南皆有據點的「大坤塑膠公司」工人，他的薪水曾與課長幾乎相同，在實施工作評等後成為「六等工」，薪水驟降兩千元，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開銷²⁹。〈秋霞的病假〉敘述一間加工出口區日資電子廠不按勞工法令給予應有福利，公部門基本上持放任態度，唯有具備法律知識又不怕周旋於企業和政府科層體系（bureaucracy），才有可能爭取回部分勞工權利³⁰。〈自己的經理〉同樣講述一家美資電子公司先是拒絕依法支付公傷補償金又惡意解雇，後來透過民眾呈情、民意代表介入才獲得應有的賠償³¹。

崇漢《金光道上》和《在風雨中》兩本小說都強調「工會受資方控制、受政府壓制」的情形，無獨有偶楊青矗〈工廠人〉（1975）、〈拜託七票〉（1978）和〈選舉名冊〉（1978）也有相似的狀況。〈工廠人〉先是一篇樂觀的故事，講述勞方候選人戰勝資方傀儡贏得工會選舉，與新工會對立的老總經理被調職³²。到了〈拜託七票〉，同樣書寫工會選舉故事的筆觸卻不再天真，現實是，在「一切以國家民族、以廠為重」的威權社會中，統治者與資本家可輕易透過各種手段操控選舉³³。另一篇以楊青矗親身參選經歷撰寫的〈選舉名冊〉，再現了此時期大小工會

²⁸ 楊青矗，〈工等五等〉，《工廠人》（高雄：文皇，1975年），頁9-26。

²⁹ 楊青矗，〈囿〉，《工廠人》（高雄：文皇，1975年），頁105-143。

³⁰ 楊青矗，〈秋霞的病假〉，《工廠女兒圈》（高雄：敦理，1978年），頁51-64。

³¹ 楊青矗，〈自己的經理〉，《工廠女兒圈》（高雄：敦理，1978年），頁145-161。

³² 楊青矗，〈工廠人〉，《工廠人》（高雄：文皇，1975年），頁223-244。

³³ 楊青矗，〈拜託七票〉，《廠煙下》（高雄：敦理，1978年），頁97-134。

組織實際上受國民黨各產職業黨部把持，失卻了為工人爭取利益的作用³⁴。作者化身的小說男主角企圖參加工人團體立委增額選舉，但中油石油工會惡意遲送他居住地高雄的會員名冊，造成文件逾期送達戶政單位，使他失去登記參選資格。他不甘參選計畫因工會失誤被破壞，要求工會設法補救，工會張書記勸他到工廠黨部辦理入黨手續，三年後再由黨提名參選，那麼一定能當選。尋求工會協助不成，他開始打電報、寫請願書，敦請政府相關單位恢復他的參選資格，都遭拒絕。他知道沒有希望後，氣不過工會刻意阻撓參選，決定狀告工會妨礙會員選舉權，卻遭到內政部和高雄市黨部派人調查他「思想是否有問題」。在黨國一體下，官司當然敗訴。

資本主義具有單向積累的特性，其獲利來自於商品價格與成本的差距，透過剝削勞動力可以使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在哈維稱之為「地緣政治民主化」的地方，這具體指在威權主義治下擁有強大勞動紀律和低工資的國家，他直接點名如新加坡和台灣就十分具有全球競爭力³⁵。《資本論》說明：「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³⁶哈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資本主義必須在技術與組織上有能動性，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體制靈活積累的出現，將勞動力由成本較高的已開發國家分散到成本較低的開發中國家，於是跨國企業的實力提昇到可以與國家權力對等談判交涉的位置，而國家必須掌控勞工權利的話語權以免減損自身利益³⁷。李光耀在 1968 年在全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簡稱 NTUC）代表大會上的演講提到：「對新加坡的生存來說，勞資關係比加薪更重要。我們必須聯手改善勞工運動，廢除束縛手腳的慣例，制止濫用附加福利。」³⁸

³⁴ 楊青矗，〈選舉名冊〉，《廠煙下》（高雄：敦理，1978 年），頁 71-96。

³⁵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胡大平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63-64。

³⁶ 卡爾·馬克思（Karl Max）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新北：聯經，2017 年），頁 619。這可解釋儘管新台國家總體生產毛額（GDP）大幅提升並創造了經濟奇蹟，卻不意味勞動者可與資本家共享經濟果實，在崇漢與楊青矗的小說都寫到了工人薪資增長幅度趕不上物價飛升的狀況。

³⁷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閻嘉譯，《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85-220。

³⁸ 李光耀，〈工會脫胎換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台北：世界書局，2000 年），頁 97。

而 1972 年成立的全國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s Council，簡稱 NWC）由勞、資、政三方組成，其原則是「加薪幅度不能大於生產力的提高。」³⁹另一邊，台灣在 1984 年「勞動基準法」公布施行以前幾乎沒有工運組織，一般工會也沒有自主地位，受限於「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與「戒嚴法」構築的非常態時期國家體制，原有的勞動法令形同具文，工會成為受黨國控制的外圍團體⁴⁰。

如果崇漢的小說往往將勞工受壓迫的問題訴諸罷工甚至暗示更激烈的革命，那麼楊青矗的小說則經常尋求體制內管道，如向政府主管機關告發、找民意代表申訴，這或許是因為新加坡繼承了英國工會動輒罷工抗議的傳統，保有從英國或馬共接收到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但七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基本上對這些行動及理論缺乏認識，無論是日治的傳統或任何可能的引進來源，都被國民政府嚴密隔絕。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克服戰後馬共威脅和新加坡獨立初期危機以後，七〇年代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的威權統治日漸穩固。與之完全相反，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後迫於外交困境與內部質疑，國府不得不走出「反攻大陸」政治神話，改行「革新保台」路線，承認台灣才是當下本土的現實，開放中央政治參與機會⁴¹。此為遷台二十年以來國民黨威權統治首次鬆動，是之後 1987 年政體轉型——解嚴的起點⁴²。這應可解釋為何崇漢的小說總是對抗爭或革命悲觀，而楊青矗的小說常流露出參與改革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崇漢的悲觀還是楊青矗的樂觀，他們的小說裡都逐漸浮現出一種新的認同：因階級抗爭而產生了對某個有限範圍「地方」的忠誠，也就是在國際分工下對「新加坡」和「台灣」的關懷。儘管馬克思（Karl Max）和恩

³⁹ 同註 38，頁 99。

⁴⁰ 梁雅慧，〈戰後台灣勞工運動研究（1945-200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9、37-38。

⁴¹ 若林正丈認為戰後台灣國民政府威權體制的鬆動與調整，其啟動時間是在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前後。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年）。另外 1972 年「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實施，增加台灣代表人數，不再增補大陸地區名額。參見不著撰者，〈總統府公報：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來源：<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294/38426>，2024 年 8 月 31 日）。

⁴² 關於 1972 年革新保台政策與 1987 年解嚴兩波轉型運動的關係，參考：湯志傑，〈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 1970 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台灣社會學》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41-190。

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產黨宣言》認為只有打破民族的藩籬，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才能破壞資本主義在全球建立的政治經濟體⁴³。但哈維在重新審視當中的地理學後，認為其中嚴重低估資本主義生產體制造成的區域差異，輕易將之機械地同質化是太過天真：

資本主義不僅通過資產階級明顯的分而治之的策略發展，而且還通過市場選擇原則轉變為集團劃分的機制來實現這個目的。其結果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地理景觀中植入形形色色的階級、性別和其他的社會劃分。諸如城市和郊區之間、區域之間及國家之間的各種劃分都不能被認為是某個舊秩序的殘餘，它們不會自動消失。它們是通過資本積累和市場結構的分化力量而主動製造出來的。通過階級鬥爭的機制以及自為的資本和雇傭勞動機構，以地方為限的忠誠擴散了，並在某些地方得到了加強而不是瓦解。階級鬥爭太容易分化成一系列地理上分裂的社群利益，太容易被資產階級權力所左右或是被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滲透所利用。⁴⁴

簡言之，哈維指出資本主義動員勞動力必須透過「某種領土組織形式」，也因此階級抗爭或革命發生的範圍必定是有界限的，從兩方面來說這都凝聚了對某個限定地方的認同，而這個地方範圍的尺度可能是某個工廠、城鎮、區域或國家，政治與經濟的「邊界」不會被輕易抹除。

這有助於我們領會楊青矗書寫台灣鄉土和加工出口區工人處境的小說，為何會挑動官方對「狹隘地域主義」的敏感神經。一開始他的作品如〈工等五等〉還可發表在國防部刊物《新文藝》⁴⁵。到了1976年，警備總司令部曾發函要求修正他已出版之短篇小說⁴⁶。同一時期，也因警總干預，使主流報紙開始避免刊登他

⁴³ 卡爾·馬克思（Karl Ma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央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台北：五南，2022年）。

⁴⁴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胡大平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9。

⁴⁵ 楊青矗，〈工等五等〉，《新文藝》第166期（1970年1月），頁86-95。

⁴⁶ 彭瑞金主編，〈文學年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97 楊青矗》（台南：台灣文學館，2017年），頁64。

的作品⁴⁷。他身為受戰後黨國右派意識型態教育成長的一代人，基本上沒有機會接觸日治台灣和五四中國左翼文學傳統⁴⁸。比較同時期新加坡崇漢帶有明顯左派革命理論和工人階級意識的小說，不論是他本人企圖循體制內管道競選，還是以書寫揭露公權力與資本家的不合理，起初沒有質疑國民政府的大中國認同，只是想改變「我們」「這裡」的工人處境，但這就觸動了官方對「政治分離主義」的警鈴，反倒使他後來驚覺「本土」真正的邊界。不過這個「本土」絕非本質主義，而是以地方為中心。正如他在小說〈重建〉（1978）描述兩位本、外省工人一開始雖有隔閡，但在十年後一場颱風過後，兩人的家族一同攜手重建家園，兩人的第二代分不出什麼本省外省⁴⁹。蕭阿勤的研究指出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興起，與一個「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有關。這個世代不分省籍、皆在台灣出生長大的，他們受黨國教育自然先天抱持「中國」國族與文化認同（但不能忘記這種「中國」、「秋海棠」認同是受國民黨篩選型塑的），可是他們唯一熟悉的「中國」社會實際上卻僅限於「台灣」範圍，因此鄉土文學關心台灣社會現實和認同「中國」並無矛盾。然而經過鄉土文學論戰和美麗島事件後，八〇年代不滿官方文藝主張的鄉土文學陣營內部分裂成不同意識型態派別，開始出現台灣國家認同⁵⁰。

這也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崇漢是如何幽微地將小說中的馬來西亞「他者化」，區別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金光道上》主角狄原和《在風雨中》主角志勇皆設定為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他們參與的工人運動都遭受挫敗。崇漢可能意識到在威權和資本主義雙重宰制之下的新加坡社會，很難讓筆下主人翁有什麼比罷工抗議更激進而可能顛覆的做法，因此兩本小說在故事的最後都將階級革命的希望寄

⁴⁷ 侯如綺的研究指出，1977年前後，警總曾要求《聯合報》副刊主編以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交代楊青矗的創作動機和背景，之後他的勞工小說便無法刊登。侯如綺，〈楊青矗小說中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台中：逢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2），頁30。

⁴⁸ 楊青矗曾在受訪時被問到：日本、中國和西方何者對他的創作影響最大？他的回答是中國，然而這種「中國」影響是受國民黨嚴格控管所形成的，事實上對他寫作最大的影響是來自於台灣民情。李昂，〈喜悅的悲憫——楊青矗訪問〉，收於彭瑞金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97：楊青矗》，頁149-163。此外謝世宗認為，楊青矗不是強調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鼓吹勞資合作的「民生主義」信徒。謝世宗，〈第七章：企業管理、性別分工與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楊青矗與陳映真比較研究〉，《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新北：群學，2019年），頁312。

⁴⁹ 楊青矗，〈重建〉，《廠煙下》，頁161-192。

⁵⁰ 蕭阿勤，〈鄉土文學、國族認同與回歸現實世代〉，《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年），頁201-262。

託在新加坡以外的某處，將可能參與馬共的角色都設定為馬來西亞人。小說這樣的敘事是將馬來西亞（人）化為他方（他者），寄託新加坡（人）己方（自我）渴求解決階級衝突的慾望。這樣的慾望在《金光道上》尚有可能實現的微弱火苗，到了《在風雨中》則完全被澆熄。

《金光道上》中學畢業不久到裕廊工廠工作的狄原，曾積極加入工人代表清堅組織的讀書會和罷工運動。他們曾被政府警告未經許可的文化活動是犯法行為，隨後讀書會舉行地點就發生不明火災。而在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平息以後，工人領袖清堅被特務逮捕坐牢，所有參與連署和抗議的工人包含狄原都被廠方開除。小說尾聲沒有交代失業的主角狄原最後何去何從，是繼續信仰清堅向他傳遞的左翼或共產思想繼續抗爭，抑或像另一位曾經參與讀書會後來又退出的工友蔡道成一樣選擇接受威權和資本主義規訓。小說最後集中書寫兩位從馬來西亞南下工作的人物雅娟和子吉，隱晦表示被遣返的兩人可能在大馬某處持續反抗。他們兩人參加罷工後被撤銷工作簽證，限制二十四小時內出境，小說暗示他們回到大馬後可能加入馬共。子吉寫信告訴狄原：「雖然隔著一條長堤，……要和更多工人兄弟姊妹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共同創造美好的日子，實現祖國的統一。」⁵¹雅娟自述「我決心做出更大的貢獻……讓我們在祖國的遠方——在戰鬥中重逢。」⁵²子吉言及的「長堤」是指橫跨柔佛海峽的「欣柔長堤」(Johor-Singapore Causeway)，不論在現實與象徵意義上，既是連接新馬兩岸的交通要道，也是分斷兩國邊界的出入境關口。子吉和雅娟口中的「祖國」與其說是曾經短暫合併過的新馬，更像是團結兩地工人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烏托邦，所謂的「統一」是指進行相同的國際共產主義路線⁵³。如果參照新加坡歷史將弔詭地發現，早在新馬合併公投時，力主贊成的是堅決反共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反對最甚者反而是被

⁵¹ 崇漢，《金光道上》（新加坡：人民文藝，1974年），頁103。

⁵² 同註51，頁104。

⁵³ 此「祖國」也不會是中國，因為戰後新、馬為了解殖獨立，已確立要拋棄僑民意識、作新國家公民。只是國家如何獨立，例如新、馬要合還是分？種族政策該怎麼平衡？國家應走民主還是共產路線？大家意見莫衷一是。戰後大部分新馬華人受當時代流行的左翼思潮影響，他們的建國的理念偏向社會主義，甚至有少數偏向共產主義，故本文將「祖國統一」解釋為共產國際所希冀建立的理想國。

視為與馬共有密切聯繫的在野黨社會主義陣線（Socialist Front）⁵⁴。在小說的結尾，作者只是將無法獲得解決的新加坡工人問題，暫時擱置於新加坡以外的馬來西亞某處。

《在風雨中》志勇利用升中四的暑假到建築工地打工，認識了一位年約三十的建築工衛井行，他是啟蒙志勇階級意識的要角，是新馬左翼小說中的典型人物，此角色在文本中亦有區別「我們」與「他們」的作用，劃分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界線。衛井行出生於馬來西亞，小說特別強調他是「無國籍者、非公民」，在新加坡工作需要拿工作簽證⁵⁵。文本在此表現了雖然同為華人，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不僅分屬不同國籍、擁有不同程度公民權利，為數不少的大馬華人沒有國籍或平等公民權，但新加坡華人基本上可自然取得國籍和平等公民權⁵⁶。暑假結束後志勇回到學校上課，因母親亞歷嫂工作的工廠爆發大規模罷工，他和友人、衛井行都前往聲援。他們在裕廊參加示威四天以後，鎮暴警察前來驅趕抗議分子，工人組織被解散，不少人被逮捕，同一時間天空下起滂沱大雨，風風火火的抗議行動狼狽結束，一切重歸公權力與資本家治下的安穩秩序。之後小說時間快轉，衛井行的宿舍被特務搜查後準備逃出新加坡加入馬共，而志勇在中四會考結束後又重返工地工作。小說收在志勇命喪工安意外，他工作的建築工地罔顧工人生命安全使用腐朽的鷹架，從高處摔落的他最後躺在血泊中死不瞑目。

三、鄉村：居不安、業不樂的「家／鄉」

七〇年代新加坡和台灣鄉土文學的另一主題，是描寫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受產業政策和產銷制度影響而凋敝的鄉村。新台國內二級產業部門（工業）的國家總體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 GDP）占比，不約而同在八〇年代初期

⁵⁴ 葉添博等著，李慧玲等譯，《白衣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史（上）》（台北：季風帶，2022年），頁233-249、265-295。

⁵⁵ 崇漢，《在風雨中》（新加坡：人民文藝，1975年），頁85。

⁵⁶ 關於馬來（西）亞憲法及其公民資格和權利，請參考：楊建成，《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頁190-202。王國璋，〈第十三章：真實與虛幻：馬來西亞華人公民地位與人權論述〉，收於陳鴻瑜主編，《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台北：華僑協會總會，2014年），頁301-330。

達到高峰，一級產業部門（農林漁牧業）占比則持續萎縮至今⁵⁷。兩國傾力發展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產業政策，造成產業結構劇變，促使勞動力往二級產業部門集中，也就是從以一級產業為主的農漁村流失⁵⁸。簡言之，在鄉村從事農漁業的收入不如到工業區或城市工作來得高，勞動力自然外流，而勞動人口流失又加劇鄉村凋敝，不斷循環。其次在鄉村內部，現代化產銷體系控制市場通路、運輸和保存設備，在資訊流通緩慢的時代，只掌握生產工具的小農小漁僅能任憑盤商喊價收購。此階段新台小說再現了兩國加入國際分工、打開國際市場以後，鄉村產值衰落和勞動人口減少，相比守著農地或漁場，前往工業區或城市就業更有「錢」景。雪上加霜的是，如果留在鄉村，鄉人沒有打入市場規模更大的遠方——包含國內城市和國外的銷售管道，由於資訊不流通也沒有議價能力，他們不得不接受擁有市場通路和現代化設備的盤商單方面宰制，不管他們歉收或豐收，都經常血本無歸。

鄉土（村）小說經常被視為是再現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文本，這點無庸置疑，然本文聚焦七〇年代鄉村的勞動關係，並將之放入國家內與國際間的尺度。人文地理學者瑪西（Doreen Massey）認為：「任何特定地方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是該地區在一系列更廣泛的國家和國際空間分工中所繼承的角色，組合而成的複雜結果。」⁵⁹肇因於國際分工和國內產業政策，鄉村勞動力外流且產值衰落，傳統一級產業生產模式總是很難在新時代中安身立命。因此在新加坡和台灣描寫農漁村的鄉土小說中，都可以看見「離開家／鄉，放棄原本賴以維生的一級產業」這種敘事，鄉村的地方感反而是以一種「對家鄉親切感和安心感的失落」所建立的。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指出，地方感不限於實體聚落範圍，同時也是意識到其他聚落的存在，對外妒羨是人類特性，但這也導出了地方認同⁶⁰。

⁵⁷ 關於新加坡和台灣國內產業別占國家總體生產毛額（GDP）之比率變化，參考：沈美辰，〈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之關係——新加坡和台灣之比較〉（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33-37。

⁵⁸ 關於1960年和八〇年代亞洲四小龍國內各生產部門勞動力占比的變化，參考：Richard E. Barrett、Soomi Chin，〈第二章：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出口導向工業化國家其相似性與差異性〉，收於弗雷德里克·德約（Frederic C. Deyo）主編，李嘉哲譯，《亞洲四小龍的政經分析》（新北：駱駝，1990年），頁16-19。

⁵⁹ Massey, Doreen, "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 (1978)," in Christophers, Brett, Rebecca Lave, Jamie Peck and Marion Werner, eds., *The Doreen Massey Reader* (Newcastle upon Tyne: Agenda Publishing, 2018), p. 87.

⁶⁰ 段義孚（Tuan Yi-Fu）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

新加坡作家呈向風書寫於七〇年代、在 1980 年集結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暗流》，是描述鄉土小人物如何被文明「暗流」淹沒的故事。⁶¹當中〈暗流〉(1980)和〈演悲劇的人〉(1980)，書寫在國家現代化計畫下鄉村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失落，工業發展前景看好使鄉村年輕人口出走。〈暗流〉故事前半段以童稚眼光對照城市與鄉村的差異，後半用已經懂事的少年視野觀察鄉村的改變⁶²。小說一開始描述七、八年前媽媽帶著「我」到鄉下外婆家參加小姨婚禮，外婆家地處偏僻又路況不佳，的士司機只願載他們一半路程。相比「我」家光滑潔白的地板和牆壁，外婆家有著粗黑板壁的亞答屋被綠樹、雞寮、豬圈環繞。多年後小姨曾上「我」家拜訪，向母親抱怨鄉下生活辛苦，羨慕嫁到城市的姐姐有房有車，希望政府早日徵收自家土地並分得組屋(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flat, 簡稱 HDB flat)，小姨丈別再養豬能到工廠做工。不久後外婆家村莊裝了兩支公共電話，於是關於小姨的八卦就能同步更新到家中：先是小姨夫婦鎮日爭吵，接著是她放著養豬種菜的工作不做，每日到市區流連忘返，最後是小姨拋夫棄女，與別人的丈夫跑了。「我」與母親趕回鄉下安慰外婆，七、八年後再次造訪，鄉村景緻已與「我」幼時記憶大不相同，叢林被剷平，到處都在挖山造路，連的士都可以直達外婆家門口。舅舅感歎自己快要失去賴以維生的傳統農畜工作，年輕一輩都只想往城市跑。「我」認為鄉村變化很大，人人都盤算自己新的出路，小姨的私逃或許只是鄉村發生改變的一個徵兆。

〈演悲劇的人〉寫新加坡離島上一對年輕夫妻，原本在家傳老雜貨店的庇蔭下過著幸福的日子，直到現代化商店入侵以及政府徵收土地計畫改變了他們的鄉村生活，妻子離家到本島工廠賺取更高工資，留在島上耕種的丈夫不甘寂寞外遇，最後家破人亡⁶³。惜月是小島上數一數二的美人，對於家務、農事都十分勤快。阿發可算是島上好人家，是島上唯一一家雜貨店的幼子。兩人是青梅竹馬，婚後不久生了一個女兒小玲。時代進步下，島上多了幾家新式店鋪，老雜貨店競爭力大不如前，阿發家族因此鬧不和分家。身為幼子的阿發只分到一間板屋和一塊薄

1998 年)，頁 160-162。

⁶¹ 呈向風，〈後記〉，《暗流》(新加坡：群島文化，1980 年)，頁 123。

⁶² 呈向風，〈暗流〉，《暗流》(新加坡：群島文化，1980 年)，頁 73-79。

⁶³ 呈向風，〈演悲劇的人〉，《暗流》(新加坡：群島文化，1980 年)，頁 93-122。

田，他辛苦種植蔬菜，收購商以盛產為由，「一斤菜心只願收七分錢」⁶⁴。本就不習慣務農的阿發，氣憤表示不如把菜都拔了改種市價高又不怕爛的菸草，夢想存夠錢後開一間自己的雜貨店，不再種田任人糟蹋。惜月聽聞在本島工廠「一日工資有六、七塊錢，願意超過工時的話一個月可賺到三百塊錢」⁶⁵。又見到朋友阿芳自從當女工後變得時髦漂亮而心生羨慕，她以加速存錢開店為理由，也為將來政府徵地後他們遲早得搬到本島組屋不能再靠種田維生預先打算，成功說服阿發讓自己到電子廠當女工。惜月每日早出晚歸，搭船通勤來回，有時加班錯過末班渡輪，只能留宿阿芳租屋處。除了工廠流水線工作，她見識到城市五光十色的消費生活，眼界漸開。一日，工廠的鉅額訂單終於趕完，惜月開心地提早回家，卻抓包阿發與隔壁金才嫂偷情。心灰意冷下她與阿發鬧翻，開始不願回家，賭氣跟著阿芳學著精心打扮、出入有錢老闆飯局。某天晚上，久未歸家的惜月本想立刻帶走女兒小玲，卻被突如其來的大雨困住，只能隔日再啟程。向惜月求和不成的阿發，在狂風暴雨的深夜悄悄悶死熟睡的小玲，最後再上吊自縊。

呈向風兩篇小說都用「家」的瓦解影射「鄉」的崩潰，但不管故事中的人物和情節如何變化，都將七〇年代新加坡時空描寫為「鄉村逐漸城市化、傳統一級產業即將消失、大家都快要搬進組屋」，這種敘事，乃星國一代人共同記憶。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土地是施行國家現代化計畫重要的物理空間，1966年通過的「土地徵用法令」賦予政府強制徵收土地的權力，大大降低了產業、住房、都市化等政策推行的阻力。透過該法令，新加坡國有土地面積占比由1960年的44%增加到2000年的90%，鄉村面積占比由建國時的85%到今日幾近全島城市化⁶⁶。類似的敘事在影視作品中也可以看見，為了慶祝新加坡建國五十週年在2016年播映的電影《我們的故事》就是從新加坡被迫獨立咬緊牙根求生存的時間點開始，一路講到1977年主角一家不得不放棄農村生活並將土地賣給國家，最後搬進政府組屋展開新生活為止⁶⁷。

⁶⁴ 同註 63，頁 95。

⁶⁵ 同註 63，頁 95。

⁶⁶ 陳劍，〈第十六章第二節：因時制宜——獨立後的國策與社會變遷〉，收於柯木林主編，《新加坡華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2015年），頁 648-651。

⁶⁷ 2016年上映的新加坡電影《我們的故事》（*Long Long Time Ago*, 2016）由梁智強導演監製，

夏鑄九的研究指出城鄉移民加劇是台灣都市化的主因，「台灣區域不均等發展（uneven development）係因世界經濟發展連動，空間組織模式連續改變，台灣本身無法控制。」⁶⁸因此「離開家／鄉，放棄原本賴以維生的一級產業」的敘事，在王拓七〇年代的短篇小說裡也可以看見。〈海葬〉（1971）祖輩傳承的討海生活似乎不再令人驕傲，「少年人留在這種地方沒前途」、「八斗子的男人的一生就是這樣：夏天捕魚、冬天賭博、逛茶室。女人就只知道生孩子、燒飯、洗衣服。」⁶⁹三十年前年輕的賴水旺，在地方信仰中心度天宮媽祖誕辰時聽到這樣的意見，三十年後的同一天依舊適用：船像沒有頂蓋的棺材、漁網如黑鬱的血塊、保佑漁民的海上女神慶典的鑼鼓聲聽起來竟是「痛愴」⁷⁰。年輕時水旺曾想離開令人窒息的家鄉外出打拼，卻被老父臭罵一頓，要他子承父業，擔起養家與傳家的責任。三十年後水旺仍懊悔自己當時沒有堅持出走，一生就這樣葬送在海邊偏僻的漁村，但已為人父的他在面對書讀得比自己多，甚至是全村最多的兒子海生時，還是掙扎是否放下父親的權威及其背後代表的「家／鄉」傳統，讓他離開八斗子闖蕩。類似的故事還有〈炸〉（1973），小說男主角陳水盛冬天不能出海，只靠妻子在薄田種植地瓜賣得一百多塊，還不夠兒子春雄的五百塊註冊費。他年輕時本來已經準備要離鄉闖天下，卻屈服於父親的權威而留下，但他認為自己不能再讓孩子吃這種苦，一定要讓春雄繼續上學，有機會離開八斗子翻身。因此他不惜借高利貸，違法買炸藥偷偷進行風險和報酬都極高的炸魚⁷¹。這兩篇小說雖未明說「離開家鄉，放棄傳統漁業」之後要到哪去、改從何種職業，但放在七〇年代工商業起飛、人口往都會區聚集的時代脈絡下很自然可以想像。

在〈金水孀〉（1975）裡離開八斗子同樣被視為「翻身」的象徵，金水孀一開始是「人人羨慕的對象」，因為她六個兒子各個讀到大學並離開窮鄉僻壤的家，

李國煌主演。

⁶⁸ 夏鑄九，〈全球經濟再結構過程中的台灣區域空間結構變遷〉，《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1987-1992》（台北：唐山，2009年），頁282。

⁶⁹ 王拓，〈海葬〉，《金水孀》（台北：香草山，1976年），頁60-61。

⁷⁰ 同註69，頁66。

⁷¹ 王拓，〈炸〉，《金水孀》（台北：香草山，1976年），頁129-164。

較長的四個已在基隆市建立家庭，大兒子阿盛當銀行經理，二兒子阿統當稅務專員，三兒子阿義和第四個兒子在現代化、規模化的遠洋漁船和商船任船長和大副，這都不是八斗子傳統漁業能比較的。當金水夫婦在村中標會，挹注資金到兒子友人牧師的生意，但牧師卻捲款潛逃後，他們在村中欠下鉅額債務，人人追喊。兒子們嘴裡嚷著窮卻坐擁新房子、新家具、新電器，沒人願意幫忙還債，完全不顧年邁父母。最後金水氣死，金水孀不得不離開八斗子到台北幫傭賺錢以償清債款⁷²。在台灣轉型為工商社會階段受資本主義衝擊下，傳統漁村的家庭倫理和鄰里關係在新時代中土崩瓦解。

七〇年代新台書寫農漁村小說第二種常見的敘事模式是「暴露或挑戰家／鄉不合理的運銷制度」。哈維提出的資本主義「時空壓縮」亦深深影響鄉村的生產經濟，小農小漁或許掌握生產工具，但他們並不擁有革新的通訊和交通技術，然而鄉人必須依靠持有這些技術的運銷制度才能販售產品。當鄉土小說敘事戳穿占盡優勢的運銷制度是如何導致鄉村經濟蕭條，識破與之合謀或放任的政府，就將隱藏在地方背後那控制與解釋空間的權力赤裸裸攤在陽光下。

出身新加坡離島德光島（Tekong Island）的崇漢，除了以刻劃裕廊為舞台的工人小說著稱，也以描繪他家鄉捕魚種菜生活的鄉土小說聞名⁷³。他最早的小說作品《怒火漁鄉》（1972）揭露地處偏僻的漁村在當地官員默許下，任由擁有現代化設備的陸記漁行壟斷本地收購市場。陸記在當地橫行多年，他們不但以低價收購漁民辛苦捕得的漁貨，還兼營高利貸事業，漁民苦不堪言，最後決定群起抗暴⁷⁴。崇漢前期作品皆有左翼小說教條化、公式化的缺點，他後期一改振臂疾呼 and 抗議性格強烈的寫作風格，於 1979 年完成、1981 年出版的中篇小說《翠園》使用平淡抒情筆觸，書寫德光島純樸鄉民任人魚肉的故事⁷⁵。他出版於 1992 年的

⁷² 王拓，〈金水孀〉，《金水孀》（台北：香草山，1976 年），頁 189-256。

⁷³ 歐清池的研究指出，建國後新加坡長篇小說中書寫的「鄉村」，只有崇漢是真正取材自新加坡，其餘若非歸化公民（如丁雲，1952-）取材馬來西亞雨林，就是書寫二戰歷史時取材馬來亞（如流軍，1940-）。參見：歐清池，〈新華當代小說史概論〉，《新華當代文學史論稿》（新加坡：斯雅舍，2010 年），頁 184。筆者認為星國產業政策和土地政策間接導致鄉土（村）小說的數量稀少，這是由於戰後新加坡從事一級產業的人口本就不多，在經濟起飛之後更嚴重萎縮，同時間土地國有化和鄉村城市化政策致使鄉村直接消失。

⁷⁴ 崇漢，《怒火漁鄉》（新加坡：群山，1972 年）。

⁷⁵ 崇漢，《翠園》（新加坡：大路，1981 年）。

最後一本長篇小說《戀念德港情》是一部懷念失落鄉土的作品，講述德光島周氏三代人及其鄰里的愛恨情仇，故事終於 1986 年德光島被國防部徵用為軍事島嶼，島民四散紛紛搬到本島組屋為止⁷⁶。

《翠園》(1981) 菜農劉家父女的悲劇，源於島上中盤商人黃氏父子勾結私會黨肆意橫行，他們仗勢自己是獨占事業壓低島上農產收購價，一有不順心就教唆流氓脅迫島民。小說以外來者文忠的親身經歷，揭開島上農民的困境。文忠是來自德光島對岸的樟宜村 (Changi Village) 人，在高中畢業即將考大學時因打傷外遇的姊夫而坐牢一年。出獄後他跟姊夫和好，但已上大學的女友另結新歡，自己也因前科求職不順，失意下決定到德光島找以前的獄友劉伯伯散心。劉伯伯之所入獄，是因在不知情下誤幫友人攜帶海洛因，刑滿後他回到自家農地「翠園」繼續種菜生活。文忠到了德光島後留在翠園幫忙農活，與劉伯伯小女兒秋蓮在朝夕相處下墜入愛河。島上中盤商黃家少東添興本就貪戀秋蓮美貌，在文忠來德光島以前有多次向秋蓮示好未果的紀錄，因此十分妒恨。添興找來私會黨騷擾劉家，又威脅劉伯伯不再收購他的菜。文忠反而藉機說服劉伯伯和其他幾位菜農，由他出面收購並運到樟宜，再委託有小販牌照能合法在巴剎做生意的姊夫和同事進行販售。此舉引來黃老闆不滿，指使私會黨徒誣陷文忠販毒。小說最後的結局是文忠再次鋃鐺入獄，秋蓮獨自在家時被添興性侵。身為小知識分子的文忠，試圖打破島上獨占收購市場與銷售通路的舉動失敗了，劉家的不幸，也代表島上其他菜農單方面受欺凌的悲歌。

空間社會學家約翰·厄里 (John Urry) 以經驗現象為基礎，定義以農業生產主導地方經濟的鄉村為：「由於沒有製造業和服務業，或存在事物皆由農業生產的社會關係所支配，特別是由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土地發展出的關係。」⁷⁷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後，原本的佃農成為獲得私有土地的小農，相比新加坡土地國有化與鄉村城市化政策，台灣農民較有選擇留在鄉村繼續從事一級產業的自由。儘管如此，在加入國際分工體系後，新台兩國鄉村的蕭條（準確來說新加坡鄉村

⁷⁶ 崇漢，《戀念德港情》（新加坡：長屋，1992 年）。

⁷⁷ 約翰·厄里 (John Urry) 著，江千綺譯，〈第五章：鄉村之重新建構〉，《消費場所》（台北：書林，2013 年），頁 105。

是直接被消滅)卻是殊途同歸。國際市場造成台灣農業的不穩定,在經濟高速成長的過程中,鄉村與城市的差距與日俱增。

一般研究雖將宋澤萊〈糶穀日記〉(1979)的重點放在不肖商人「騙穀」,批判資本主義邪惡和政府無能,不過本文將焦點放在政府公糧收購政策,也就是農會對稻米的「保證價格收購」,這正反映了上述厄里所言「土地——農業生產的社會關係」⁷⁸。公糧制度並非台灣獨有,為維護社會安全,作為戰略物資的糧食必須穩定生產,稻米是台灣主要糧食作物,「保證價格收購」是政府設立一個基準價格,若市場價格低於此,各地農會將以此基準價收購部分賣不出去的稻米,論者認為這是維持台灣糧食安全以及保障農民收益的措施⁷⁹。小說中留在打牛湳村種地的都是一些沒有其他謀生能力的村人,原本村中最有錢有勢的三大家族,自三七五減租後,林烏賣地舉家遷往城市做大企業,村長王犁分家後影響力大不如前,只剩李鐵道一人以家父長的權威,強迫所有不情願的兒孫留在家鄉種地⁸⁰。五月正是打牛湳村第一期稻作即將收成的季節,卻不幸遇上連日至災豪雨,搶收下來的穀米不是差一步完全飽實,就是未刈的稻仔恐要發芽,村民心裡有數,這一季穀價恐要不好。打牛湳村出售稻米的優先順序,先是出價可能較高但也較挑剔品質的糧商,再來才是「保價收購」的農會。

本文無意探討公糧政策的優劣,當然市場經濟和政府政策從不完美,人性的貪婪與惡意並不分職業和地域。小說中北部來的稻販在商言商,告知村民水患讓全台稻價暴跌,他能出的價格遠低於該期稻作農會的保收價。然而此時卻殺出一個從未收購過稻米的林白乙,他的收購價格高於北部商販,雖然收購價還是低於農會,卻沒有農會保收數量上的限制,表示村民有多少米他就願意收多少。但林白乙聲明糶穀時先付三成現金,待所有米收購完成,大家再到林家古厝領錢。林白乙是林烏的兒子,雖然他早已搬到城裡,村民們想著他「畢竟是同一塊泥,同

⁷⁸ 此類研究代表如:陳建忠,〈第三章:鄉土的召喚:鄉土寫實時期小說析論〉,《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晨星,2007年),頁98-99。

⁷⁹ 陳雅惠,〈台灣稻米產業補貼政策調整之經濟分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⁸⁰ 本文使用版本為:宋澤萊,〈糶穀日記〉,《打牛湳村》(台北:前衛,2013),頁168-174。

底根來成長的」⁸¹，對他所出的高價和口頭條件不疑有他。然而也不是所有打牛湍村村民都願意糶穀給林白乙，他們清楚知道本期稻作合理市場價格，依循正常契約銀貨兩訖。結果是，以打牛湍村望族身分博取信任、被視為地方救星的林家，其實是有計畫惡意詐騙，大部分村民米財兩失。覺得遭受背叛的村民本來氣憤得想告他詐欺，卻被同是受害者的陳老師說沒有證據根本告不成。最後小說時間來到一期與二期稻作之間的空檔，農會發下瓜果種子，很快七月中旬美濃瓜和梨仔瓜收成了，市場收購價大好，打牛湍村也將要從五月的挫折中恢復元氣。

台灣農民或許掌握作為生產工具的土地，但通常缺乏運銷技術和相關知識，當他們追求更高利潤種植經濟作物，又沒有公權力像對糧食作物那般進行調節或保障時，擁有運輸設備和市場通路的盤商，真正利用了資訊差，對不屬於規模經濟種植也沒有保存設施的小農進行惡意削價，「打牛湍村系列」另一篇小說〈笙仔和貴仔傳奇〉（1978）就是這樣的故事⁸²。蕭笙和蕭貴代表兩種極端類型農民，哥哥笙仔為人和藹樂天，但缺少心機的結果是村人和盤商都特別喜歡欺負他；弟弟貴仔是兼有橐駝之技和高農學歷的小知識分子，他為人孤僻悲觀，村人酷愛嘲笑他的鬱鬱不得志和憤世嫉俗。打牛湍村正是梨仔瓜成熟的季節，笙仔連日喜孜孜地將一車車澄黃的瓜果運往崙仔頂瓜果市場，等待北部來的運銷販挑選喊價。瓜販看他老實可欺，不是聯合壓低報價讓他少於行情出售，就是要流氓威逼他只賣漂亮的瓜果。到了下雨的日子，瓜販更掌握所有瓜農害怕水果爛掉、價格下跌的恐懼，故意拖延出價凌遲人心。另一邊的貴仔就不一樣了，他知道就像早些年打牛湍村瘋種外銷歐洲的洋菇時一樣，產量過剩只會導致價格失衡，但「愚昧的打牛湍永遠搞不懂」⁸³。他曾試著和中盤商建立平等互惠的交易關係，但占盡絕對運銷優勢的盤商還是可以單方面任意欺凌他；他也曾設法繞過中盤商的剝削直接到城市尋找銷售通路，但他想得到的據點別人也想到了，甚至還需要削價競爭；他還嘗試過到偏遠的鄉村開發新市場，但鄉村根本沒有消費力。

⁸¹ 同註 80，頁 217。

⁸² 本文使用版本為：宋澤萊，〈笙仔和貴仔傳奇〉，《打牛湍村》（台北：前衛，2013 年），頁 1-72。

⁸³ 同註 82，頁 11。

雖然笙仔比一般村人更知道「黑暗的打牛滴」的問題癥結，但他個人有限的力量難以撥正整個不公平的結構。就在梨仔瓜產季過了一半，有許多瓜果都已沒人要了的時節，打牛滴村四處張貼著「寫著密密麻麻條文」的宣傳單，可惜上面的內容大部分屬於文盲的村民根本無從閱讀，諷刺的是他們還以為那是「縣府公告」。後來村人聽說那是貴仔「建議要改革崙仔頂的瓜市場的，還要鼓勵打牛滴的人團結起來打商販。」⁸⁴故事結束在蕭家兄弟後來都被請到警局，這成了打牛滴村茶餘飯後的談資與笑料。范銘如以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空間三元論中的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 of space）分析〈笙仔和貴仔傳奇〉，指出該小說「企圖挑戰對台灣土地與農村進行分配、再生產的政經霸權」⁸⁵。她認為文本中崙仔頂市場之於打牛滴村，象徵著資本家與無能官僚任意宰割和漠視農民，小說不只揭發了那控制空間權力背後的意識型態，更問責了他的合理性。

四、小結：跨國資本與黨國威權主義結合下逐漸清晰的「鄉／國」輪廓

經歷政治危機與經濟轉型，七〇年代新台鄉土小說，或揭示或質疑了黨國威權和跨國資本主義結合下那控制地方的權力，思考兩國納入國際分工、經濟起飛下帶給「我們」社會什麼改變，是利是弊？因此攸關身分認同的「鄉／國」輪廓，就在此思辯過程中逐漸清晰。崇漢與楊青矗書寫工業區的小說重劃了文學「本土」的邊界，恰如哈維對「階級抗爭反而會產生地方性忠誠」的觀察，此地方尺度可從最基本的工廠擴散到城鎮、國家，但要成為馬克思無產階級理論那般「只論階級、抹除地理差異」並不容易。崇漢小說藉由將馬來西亞他者化，投射新加坡自身無法解決的階級革命慾望，區別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楊青矗為南部工廠工人打抱不平的小說內容，以及他的作品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成為重要的討論對象，乃至親自投身地方選舉、因美麗事件入獄等政治行動，都使他逐漸覺悟到台灣與中

⁸⁴ 同註 82，頁 72。

⁸⁵ 范銘如，〈七〇年代鄉土小說的「土」生土長〉，《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 年），頁 175。

國的不同⁸⁶。在呈向風、崇漢以及王拓、宋澤萊書寫兩國鄉村的小說中，本文將之分為兩種敘事模式：「離開家／鄉，放棄原本賴以維生的一級產業」以及「暴露或挑戰家／鄉一級產業不合理的運銷制度」。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兩國國內城鄉不均等發展與國際分工經濟體系連動，國家本身不能控制。從人文主義地理學角度觀之，家／鄉不再是能安居樂「業」的所在，地方感反而在「地方認同危機」中得到鞏固。

若將本文討論新台「重劃出本土邊界」的小說，放回文學史長河之中，可發現兩國在戰後逐漸成為穩定的獨立政治實體、成為國際分工下重要的獨立經濟實體後，隨之而來的是七〇年代小說敘事出現了新本土／國家認同的想像。五、六〇年代新加坡華文小說再現的文本空間，漸由關注中國本土與範圍模糊的「南洋」慢慢轉往關心有明確地理界線的馬來半島；同一時期台灣囿於國府反共文藝政策的控制，小說再現的文本空間也傾向虛幻的秋海棠中國大陸⁸⁷。但無論戰後新加坡如何想像自己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台灣如何堅稱尚擁有秋海棠中國的統治權，兩地政府在有限主權領土範圍內的空間治理——包含系列產業政策、土地改革，慢慢在國內外取得巨大成效。因此七〇年代新台再現工業區勞工生活與鄉村一級產業凋敝的小說，正如哈維對資本主義在空間運作的觀察那般，一方面再現了國家與資本如何支配了空間，一方面再現了在此空間經驗下凝聚出的地方認同、對支配空間權力的不滿或挑戰。從小說再現的文本空間來看，七〇年代以後新台鄉土文學確實已重劃出國家「本土」的邊界了，文學國家想像的版圖，漸與安德森想像上政治共同體有限的主權領土範圍重合。

⁸⁶ 蕭阿勤，〈鄉土文學、國族認同與回歸現實世代〉，《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年），頁 201-262。

⁸⁷ 筆者將另有專文處理五、六〇年代新加坡台灣小說再現空間之比較研究。五、六〇年代新加坡小說的文本空間，是從反省二戰經驗、書寫中國和「南洋」漸變為關注馬來半島獨立問題、書寫新馬；同時台灣是從反共懷鄉文學到現代主義、再到早期鄉土文學（亦即范銘如提出如黃春明（1935-）、王禎和（1940-1990）「鄉人文學」）的出現，在文本空間上是從中國逐漸聚焦台灣。關於「鄉人文學」，參見：同註 85，頁 153-178。

參考書目

一、專書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閻嘉譯，《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胡大平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王志弘等譯，《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議》(新北：群學，2010 年)。

王拓，《金水孀》(台北：香草山，1976 年)。

弗雷德里克·德約 (Frederic C. Deyo) 主編，李嘉哲譯，《亞洲四小龍的政經分析》(新北：駱駝，1990 年)。

卡爾·馬克思 (Karl Max)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 (第一卷)》(新北：聯經，2017 年)。

卡爾·馬克思 (Karl Ma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著，中央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台北：五南，2022 年)。

呈向風，《暗流》(新加坡：群島文化，1980 年)。

宋澤萊，《打牛湳村》(台北：前衛，2013 年)。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台北：世界書局，2000 年)。

南洋商報、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編，《吾土吾民創作選小說 (上)》(新加坡：南洋商報，1982 年)。

柯木林主編，《新加坡華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2015 年)。

段義孚 (Tuan Yi-Fu)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約翰·厄里 (John Urry) 著，江千綺譯，《消費場所》(台北：書林，2013 年)。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年)。

-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年）。
- 夏鑄九，《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 1987-1992》（台北：唐山，2009年）。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年）。
- 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78年）。
- 崇漢，《怒火漁鄉》（新加坡：群山，1972年）。
- 崇漢，《金光道上》（新加坡：人民文藝，1974年）。
- 崇漢，《在風雨中》（新加坡：人民文藝，1975年）。
- 崇漢，《翠園》（新加坡：大路，1981年）。
- 崇漢，《戀念德港情》（新加坡：長屋，1992年）。
- 張青，《新加坡：創造經濟奇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陳建忠，《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晨星，2007年）。
- 陳鴻瑜主編，《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台北：華僑協會總會，2014年）。
- 陳鴻瑜，《新加坡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年）。
- 彭瑞金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97：楊青矗》（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7年）。
- 黃孟文、徐迺翔主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2002年）。
- 新加坡作家協會編，《新華作家傳略》（新加坡：新加坡國家圖書館，1994年）。
- 楊青矗，《工廠人》（高雄：文星，1975年）。
- 楊青矗，《工廠女兒圈》（高雄：敦理，1978年）。
- 楊青矗，《廠煙下》（高雄：敦理，1978年）。
- 楊建成，《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 葉添博等著，李慧玲等譯，《白衣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史（上）》（台北：季風帶，2022年）。
- 歐清池，《新華當代文學史論稿》（新加坡：斯雅舍，2010年）。
-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年）。

謝世宗，《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新北：群學，2019年）。

瞿宛文，《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唐山，2003年）。

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緣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新北：聯經，2017年）。

瞿宛文，《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新北：聯經，2020年）。

瞿宛文，《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新北：聯經，2022年）。

Christophers, Brett, Rebecca Lave, Jamie Peck and Marion Werner, eds., *The Doreen Massey Reader* (Newcastle upon Tyne: Agenda Publishing, 2018).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王振寰、方孝鼎，〈國家機器、勞工政策與勞工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3期（1992年11月），頁1-29。

湯志傑，〈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台灣社會學》第12期（2006年12月），頁141-190。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論馬華文學的創傷現代性〉，《中外文學》34卷8期（2016年1月），頁175-192。

（二）學位論文

沈美辰，〈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之關係——新加坡和台灣之比較〉（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侯如綺，〈楊青矗小說中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台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

梁雅慧，〈戰後台灣勞工運動研究（1945-200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陳雅惠，〈台灣稻米產業補貼政策調整之經濟分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黃閔新，〈發展型國家的持續與變遷：台灣及新加坡產業轉型策略的比較分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謝春馨，〈八〇年代「臺灣文學」正名論〉（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

三、雜誌文章

楊青矗，〈工等五等〉，《新文藝》第166期（1970年1月），頁86-95。

四、電子媒體

不著撰者，〈總統府公報：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來源：<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294/38426>，2024年8月31日）。

不著撰者，〈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來源：<https://www.eld.gov.sg/legislation.html>，2024年8月31日）。

陳志銳，〈新加坡華族文化百科：新加坡華文文學概述〉，（來源：<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literature/overview-of-singapore-chinese-literature/>，2024年8月31日）。